

“取款自由”还是“资金安全”？

银行一线风控的两难困境

近期,“律师取现被盘问用途”事件引发热议,恰逢央行等三部门推进取消“个人存取款5万元以上登记用途”规定的政策调整期。近日,笔者以储户身份致电国内多地银行,发现被咨询的几家银行标准有所差异,但在取现时均会询问资金用途。

“现在公安局要求超过1万元客户扫码登记,超过2万元还要加柜面手工登记。”一位国有大行业务主管透露,对不符合常理或前言不搭后语的取现行

为,银行会进一步询问,并设置了“反诈扫码确认”环节,让客户直接查看警方风险提示。

“客户取现时按诈骗团伙教的方法应对询问,钱取走被骗了,责任却要我们担。”上述国有大行业务主管道出了银行一线风控人员的普遍困境。

他呼吁,当“守钱袋子”的银行被部分储户视为“麻烦”时,这场关乎“取款自由”与“资金安全”的拉锯战,亟待更明晰的规则来破局。

争议漩涡:

从政策松绑到实操紧绷

个人单笔存取现金5万元以上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规定,最初计划于2022年3月1日起实施,依据是当时监管部门联合发布的《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》。

2025年8月,央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、证监会发布《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,拟取消执行仅三年的“个人单笔存取现金5万元以上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”的规定。这一调整被视为对2022年政策的优化,旨在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。

然而,政策尚未正式落地,部分银行基于现有风控要求,仍延续了对大额取现的审核流程。

近期引发关注的律师取现案例,反映了部分储户对取款流程的疑虑。11月5日,律师周筱赟在中国建设银行山东东营支行取现不足5万元时,被柜员要求说明具体用途,甚至被追问历史转账记录。因未配合核查,银行声称已联系反诈中心出警。尽管事件最终以“未出警”收场,但该经历经社交媒体发酵后,迅速掀起对银行权限越界的质疑。

此类情况在现行风控体系中并不罕见。据了解,银行对5万元以上取现普遍采取预约制,并要求说明用途。多位银行从业者表示,这些流程是反诈工作的常规环节。

一位银行一线业务人员表示,询问取款用途、核对流水等流程,主要是为了识别潜在风险交易,保护储户资金安全。

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诈骗案例,每一步核实都是在为客户的‘钱袋子’加一道锁。”西部地区某股份行从业人员表示,现金交易难以追

踪,易被犯罪分子利用。银行若未尽核查义务,可能被追责。

“被客户起诉的那个支行问得细致,可能是该行被处理过。多问一句总比摊上事好。”前述大行业务主管解释道,“流水涉案多半是帮犯罪分子过渡资金,但更多人其实是取自己的钱被骗。我们询问用途,主要是怕客户被骗。”

政策层面放宽与实操层面收紧的鲜明反差,反映出金融机构在反洗钱、反诈压力下的两难处境。

银行员工被问:

“客户被骗,我们会被追责”

银行严控现金交易的逻辑,根植于近年电信诈骗与跨境赌博的高发态势。公安部数据显示,2024年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9.4万起。在此背景下,2022年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建立风险防控机制,强化警银联动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央行取消5万元登记用途的规定,本质是推行风险分级管理,将资源集中于更高风险领域。但政策在基层落实需要过渡期。“政策意图是精准打击犯罪,而非限制普通金融活动。”分析人士表示。

为何在政策松绑背景下,银行却仍然未放松审核标准?

一资深银行业分析人士表示,深层原因在于政策执行与风险责任的错配。

他表示,有关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反诈考核日趋严格,银行若未能拦截涉案资金,可能面临约谈、业务暂停等处罚;反之,过度审核却鲜被问责。这种“多做不错、少做易错”的机制,促使银行采取防御性风控措施。

“有时候银行也很崩溃,取出去的钱被骗了,真的会被追责。”前述大行业务主管无奈表示,“每天都是靠心中的正义感来推动这项工作。”

“被洗脑不深的客户还能劝回,

但被洗脑严重的客户会给你编得一套一套的,我们也只能尽职尽责。”该主管坦言,银行员工常需凭借经验判断,“对不符合常理或前言不搭后语的取现行为,会进一步询问”。

“特别是对老年人或突发大额取现的客户,多问一句可能就能避免一起诈骗。”西部地区一位股份行工作人员坦言。

这种看似繁琐的流程,实则是责任倒逼下的选择。据了解,某银行员工就曾因客户涉诈而被罚款。

“我们行也出现过,员工没有做好取现用途的询问,客户被骗后报案,最后员工被罚款了。”该主管透露。

各地银行执行不一

近日,笔者致电国内多地银行,发现接受咨询的银行办理取现的业务流程有所差异,不过在取现时均会询问资金用途。

工商银行广州一支行工作人员表示,取5万元以内现金无需预约,持银行卡和身份证到柜台办理即可;但若账户在48小时内有人账,办理业务时可能需要额外核实资金来源。

中国银行桂林一支行表示,取款携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即可办理,工作人员会例行询问资金用途以防范诈骗,仅为提醒客户确认自身操作安全。“只有在账户被公安机关冻结的情况下,才需要按要求提供额外材料。”该工作人员表示,大额取现较少见,通常转账即可满足需求,取现行为容易与诈骗关联,因此银行增加询问环节以保障客户资金安全。

招商银行长沙一支行工作人员表示,自己支行这片区域属于电诈高发地区,银行因反诈要求,需要核实资金来源及用途。若客户选择大额取现,银行需与公安机联网核查,信息不清晰时可能触发出警核实。“一般正常用途很少用到大额取现,转账的话流程就很简单,因为转账可以追溯,现金交易没法溯源。”

浦发银行合肥一支行工作人员表示,取款5万元以上需要提前一天电话预约确保库存现金足够。取款时工作人员会对取款用途进行口头询问,无其他额外审查要求。

民生银行上海一支行表示,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进行预约,带上身份证和银行卡就可以。

光大银行深圳一支行表示,5万元以内当天就可以去,5万元以上需要提前一天预约,“取款就问一下用



途,正常说一下就行”。

中信银行北京一支行工作人员表示,取款超过5万元会由公安来进行反诈宣讲;5万元以内是否需要核查取决于系统提示,涉及大数据抓取。客户只需携带银行卡和身份证即可办理。

“取款自由”非绝对权利

争议背后,更值得关注的是金融机构权力边界的界定。法律层面,《商业银行法》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“取款自由”原则,而《反洗钱法》第三十条亦要求风控措施“与洗钱风险状况相匹配”。

“需要注意的是,‘取款自由’并非绝对权利,而是受金融监管义务约束的相对自由。”分析人士表示,《商业银行法》第二十九条确实保障储户的取款自由,但该自由的前提是交易合法、身份真实、资金来源合规。银行作为金融机构,依法负有反洗钱、反诈等法定义务,当某笔取款或账户行为被系统识别为“可疑”时,银行有权也有义务进行必要核查。此时的“自由”并不意味着银行必须无条件放行,而是在履行审慎审查义务后,若风险排除,即应恢复自由支取。

如何在风险防控与服务优化间寻求平衡?业内人士认为,需要金融机构、监管部门和储户的共同参与。

其一,统一执行标准,杜绝层层加码。

其二,技术赋能替代人工干预。多家银行已试点智能风控系统,通过交易行为来分析识别可疑账户。例如,对长期休眠账户突然大额取现、多账户集中向少数账户转账等模式进行自动预警,减少对正常交易的干扰。

其三,深化公众沟通与权责教育。银行需明确告知储户审核的法律依据及反诈目的,而非简单以“规定”搪塞。

其四,完善警银协作机制。“反诈工作要互相配合,现在我们为了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在努力,部分储户却不理解。”前述银行业务主管呼吁加强社会认知。目前公安机关与银行正在完善风险信息共享平台,让合规交易快速通行。同时,多家银行在网点设置“反诈扫码确认”环节,让客户直接查看警方风险提示。

业内人士指出,通过精准的风控策略、清晰的法律边界与透明的公众沟通,才能让“取款自由”真正回归常态。

刘嘉魁

正常经济生活 需要松绑

□光明

今年8月,央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、证监会发布《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,拟取消执行仅三年的“个人单笔存取现金5万元以上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”规定。

将视野放得更远,各种严格管理不只体现在存取款上,而触及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。比如今年10月,河南一农户以28万的价格卖掉了100多吨小麦,收款后资金因涉诈被冻结,在媒体的关注下才解冻;有些地方办电话卡都要求提供“无犯罪证明”,理由也是“反诈”……

可以想象,那位农户当时有多慌张。这些要求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不便,更重要的是,它传递了一种不确定的紧张感:人们无法预知在哪个环节会被视为“可疑”、又会因为什么理由被限制交易乃至冻结资金。

久而久之,原本应当自由、顺畅的经济生活,被层层加码的审查和不透明的标准挤压得步步维艰,人们也会倾向于抑制经济行为以规避难以预知的风险。由此便进入了负向循环:监管越繁复,人们行为越谨慎;行为越谨慎,经济生活越趋于收缩。

无人可以否认反诈的重要性。可有效的反诈应当是精准、专业、分层、有边界的,能瞄准薄弱环节,在关键时刻体现出应有的敏锐。这也是所有人的期望——自己的资金能够得到保护,诈骗分子能被绳之以法。

同时,反诈也应考虑社会经济流动,不至于让公众在正常经济活动中处处受阻。从社会层面看,经济生活血脉不畅的损失同样不可估量。如何在反诈和促经济之间取得平衡,其间尺度如何拿捏,是必须直面的考题。